

中国美术会会员作品展览外，由2008年开始，我举办了四场书法个展，将友人的赞助和义卖作品所得，先后三次注入“清华校友——宗家源励学基金”。我自己由中

学到大学，都是靠助学金才完成学业，非常能够感受到贫苦学生的困境，这只是小小的回馈，以表心意。

爱我清华

——毕业六十年回顾

○刘观宵（1954 动力）

1952年，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后的一年，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夕。当时，我们的祖国满目疮痍，百废待兴。我参加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的入学考试，并填报志愿。因为在中学里读过朱自

清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，如诗如画的清华园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，因此第一志愿就填了清华大学机械系。当时，绝大多数青年都愿学工科，以建设现代化国家，摘掉工业落后的帽子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等待，高考录取的名单终于在各大报纸上公布了。我有幸在清华机械华东地区录取名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同时被录取的还有我高中同班同学黄正昆。那是我一生中 happiest 的时刻。不久又接到清华的通知书。9月下旬，我们二人同行，从扬州出发第一次渡江，乘火车北上，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园。

院系调整后的清华，已经是一所新型的工业大学。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制度，采用苏联教材，各系还有苏联专家指导教学。入学新生经过学校动员，个人报名，组织批准，进行了分科分系，我被分配到动力机械系热力发电专修科，我的同学被分配到机械制造系铸造专修科（一年后也被批准留苏）。当时全校有电机、机械制造、动力机械、土木、水利、建筑、无线电等七个系，在校生约5000余人。解放后



1954年8月毕业前，刘观宵与同学郑文光（右）田安平（左）合影

□ 值年园地

首任校长是蒋南翔，副校长刘仙洲，我们动力系主任是庄前鼎先生。

两年的大学生活，虽然短暂，但紧张而又充实，愉快而又潇洒，充满朝气，终生难忘。每天除了上课、图书馆自习、校内实习、工厂实习、社团活动，体育锻炼包括打球、长跑、游泳、滑冰，春天组织去八达岭长城、樱桃沟郊游。周末有电影、舞会，大家自由参加，也可三三两两散步在水木清华或荷花池的淡淡月色中。沿路的杨柳树缝里漏着点点路灯微光，偶尔还听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，迷迷蒙蒙的夜色，弯弯曲曲的小路，令人陶醉。

暑假两次赴现场实习，一次是电站施工中的机组安装实习，一次是在发电厂的生产车间运行实习。有一次还是庄前鼎系主任带队，真可谓全力以赴，精心关怀，竭尽全力地要把我们培养成院系调整后第一批“又红又专”的合格人才。这两年的时间里，没有任何政治运动的干扰，老师一心一意地教，同学一心一意地学，学校的学习风气甚浓，同学们的思想也较为单纯，我们大都是两年没有回过家。

1954年8月中旬，我们结束了俄文速成班学习，面临毕业分配，全校共有600余人将走上工作岗位。共青团中央、北京市在天安门前举行了欢送首都大学毕业生晚会，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亲切祝贺同学们从学校走向生活，并指出：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贡献，必然坚决服从分配，克服一切困难，继续虚心学习。当天午夜，全市毕业同学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联欢，气氛热烈。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，蒋南翔校长勉励我们，要适应新环

境，就必须认识“存在决定意识”。是工作选择人，而不是人选择工作。他具体指出，要做好工作就必须做到：第一，要善于劳动；第二，要有知识；第三，要群众化，善于与人合作；第四，要经常进行自我教育。

分配名单公布后，学生会举行聚餐、营火晚会、化装舞会、京剧演出等活动，欢送全体毕业同学。大家都以极其兴奋的心情，服从祖国分配，到基层去、到边疆去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。我班毕业时共22人，除4人分配在高校外，其余均分散在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中南、华南各地基层电力企业，几乎每单位1人，可见当时人才奇缺。我被分配在华北电管局，也非常出乎意料，因为当时留在北京的机会很少，我也没有要求。报到后又分配我到天津电业局，又指定我去天津一厂报到。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就是在天津一厂从事生产和扩建一台2.5万千瓦机组中度过的。

1958年“大跃进”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，我被调至河北保定热电厂搞筹建，完成三炉两机投产，还参加大炼钢铁。1965年国家提出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以后，毛主席提出：备战备荒为人民，要建设大三线，我又被调往四川西南电力建设局，为云贵川的电力建设一干就是17年。在此期间，遵循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的原则，我参与选厂，踏遍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，探测天然溶洞，最后在渡口和乐山地区建成两个进洞的电厂。文革十年，在军管的情况下，我还是完成了一台高温高压的10万千瓦机组的投产，还获得国务院贺电表彰。

改革开放以后的1982年，我来到浙江

省电力局，直至1992年底退休。接着又受聘于电力部、国家能源投资公司驻上海地区大型电力设备制造厂总代表组，任浙江首席代表。继续发挥余热八年，直至2000年完全休息。这时已是“九五”末期。回想起来，我从“一五”到“九五”，基本上达到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目标。昔日的年轻小伙，如今已满头银发，跨入“80后”的行列。几十年来，无论在平原还是山区，在内地还是沿海，爬高山、进溶洞，登上100多米的烟囱，

四五十米高的锅炉；无论在机组紧张施工阶段，还是最后72小时的整套机组试运连续作战，我从未感到身体不适或因病休假。这都应归功于学校对劳卫制锻炼的严格要求，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结果。

光阴荏苒，六十年一甲子，弹指一挥间。重温当年在清华园的美好时光，我们不能忘记母校的精心培养和恩师们的谆谆教诲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

清华，我成长的摇篮，我永远爱你！

探索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之路

○傅正泰（1954 水利）

1954年，我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工结构专业，留校担任理论力学基础课教学工作，之后在清华工作了整整30个春秋。1984年，我离开清华创办了海淀走读大学。清华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校训，清华严谨治学、精益求精的学风，以及以天下为己任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深深溶入到我的灵魂之中，影响了我一生的教学、研究和办学实践。



1988年5月，傅正泰校长（左1）和返校毕业生在双榆树校区欢聚

我一生酷爱教育事业。在清华早期的教学活动中，我曾总结清华上世纪60年代的教学经验，写出论文《萃取精华精通精华》，不仅发表在清华《教育通讯》创刊号上，还得到蒋南翔校长的大力支持，在清华校内交流推广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社会上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，但国家确有困难，原因有二：第一，国家经济困难，拿不出更多钱来发展高等教育；第二，大学生都是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，国家经济规模总量小，没有那么多的专业岗位，政府担心毕业生多了不好就业，怕引发新的社会矛盾。

西方国家战后经济发展很快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重视教育。美国的大学生比例很高且不说，日本、韩国每10万人口已有大学生2500—3000人，而中国每10万人口大学生只有200—300人，只有少数精英才